

鉴赏热点

“文房”热南北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儿，却又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丰富多样的制作工艺与材质，凝聚了历代文人的智慧与审美，折射出古代高雅的清居生活。随着收藏家队伍在历史文化认知上的逐步成熟与深入，曾经一度颠倒的传统艺术价值体系正在回归，并迈向一个新的平衡。文房清玩作为这个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近来拍场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编者



田黄冻达摩面壁像
杨玉璇

文房拍场 稳步向好

在今年7月的杭州西泠春拍中，张充和上款及旧藏的印章与手札，因其丰富的文献价值而受到热烈追捧。其中一枚由张充和收藏并题签的“吴昌硕刻瑞兽钮白芙蓉石李国芝自用印”（1916年作），估价8万到10万元，结果买家们一路竞标，迅速把成交价推高到56万元才作罢。众所周知，吴昌硕是近代中国的艺术大师，诗、书、画、印皆精，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而李国芝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孙子，民国后在上海开设银行，创办民营“李树德堂电台”。此印章，吴昌硕以石鼓文入篆，印文“滋园”，刀融于笔，烂漫天真，乃印与石的完美结合。

除了以西泠拍卖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之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拍场

和以香港为集散地的国际拍场上，“文房热”同样各有特色。5月中旬，中国嘉德春拍上的“翦淞阁”文房清供专场以8400万元的总额百分之百成交，45件拍品均价近200万元。该专场以民初上海大鉴赏家——瞻麓斋龚心钊旧藏古器珍品为主轴，包括砚台、印章、笔筒、毛笔、刀尺、香筒以及香炉等。其中“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杨玉璇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合称“禅宗组曲”，估价仅为每件200万元左右的拍品，分别以1064万元和1568万元成交。一把1948年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相明石瓢壶”以1232万元创出紫砂壶新纪录，成为该场又一大亮点。

“翦淞阁”的主人是台北文房清供收藏名家黄玄龙。对于市场，黄玄龙有敏锐见解，“过去几十年，中国文物市场一直由西方主导，顺着西方的喜好和趋势。但是西方人不练书法，他们

不看好文房。所以如果文房市场渐渐走好的话，这也代表中国的市场开始兴起了。”

传统中国艺术 价值回归

这样的市场反响并非空穴来风。前几年，“文房热”在国内拍场已悄然兴起。2009年春拍至今，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频传捷报，由此清晰可见：先是古画价格升天，然后古字扬眉吐气；几乎同时，文房清玩也顺势高涨。这一联动效应十分明显。而牵引这一效应持续蔓延的力量正是传统中国艺术的价值回归。

中央美院教授龚继遂去年曾针对书法拍品过亿的现象专门写道：“多年来，中国传世的瓷器精品的价格一直比书画贵，主要是因为陶瓷有分布广泛的国际藏家，日本和欧美都有独立和完备的学术研究和公私收

藏，因而形成了多元竞价的市场格局，使陶瓷名品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而中国传统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字画等文人艺术品居先，其文化内涵及价值远远高于陶瓷。这种字画优先的认同由于需要相当的文史知识作为判断和欣赏的前提，而在国际藏家中难以普及。”这一倒置的现象在书法方面尤为严重。直到2009年秋拍中，出现2件超过亿元人民币的书法作品，一件是曾巩的《局事帖》，一件是朱熹、张景修等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才算是书法尊荣的开始回归。2010年春拍中，聚焦最多的那件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作品《砥柱铭》以4.32亿元创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在中国书画的收藏历史中，书法作品之声望本来就远在绘画之上。这是因为书法作为前人手泽，其作者的历史

地位和文化名气远在画家之上。在以文人官僚为收藏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秩序是藏家共识。一直到民国以后，毛笔退出书写的主流，读图时代兴起，字画市场才形成画贵于字的格局。”龚继遂分析。

文人艺术传统的中心思想一直把一小撮儿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雅士所创作的东西奉为最具意义的艺术，这当中不仅包括诗词、音乐、绘画、书法、印章，在一些信手拈来直接可用的物件上雕刻，如软石、竹、木等，也同样受到重视。其次，便是由文人按其喜好请工匠制成的物品，其中的工艺或许是文人艺术家认为涉及过多手工，而不愿意从事的，如玉刻、铜铸、家具制作等。时至今日，中国艺术收藏界正在快速回归到传统等级制度。相信，在未来，各样艺术门类之间也会迈向一个新的平衡……

本报综合



▲明 掐丝珐琅鸳鸯香薰一对

►明嘉靖刻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义廿五卷》

◀清乾隆 白玉雕楼台赏月山子

▲“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

▲独占鳌头鎏金珐琅铜笔格

▲御制紫檀雕云龙文具盒

◀清乾隆 掐丝珐琅暗八仙云蝠纹双桃形洗

▲清 乾隆剔红饕餮纹紫砂壶

延伸阅读

“文房”的繁衍

文房用器兴盛于隋唐。随着隋朝科举的开始，隋唐文人阶层壮大，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纷纷涌现，且远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代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也有“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句。此处的“文房”，就已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及至宋代，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撰写了

《文房四谱》一书，此书是首次提出“文房四宝”的典籍。而第一个将文玩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编撰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他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还远不止这些。经过宋元的普及和拓展，文房清玩到了明代更加蓬勃。追求文玩蔚然成风。明初曹昭编写的《格古要论》，将文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

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之，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体现了明代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生活观。而后，清代文玩的繁荣，除了文人的精心追求外，更源于康熙乾隆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相关珍藏展览上，即可窥见一隅。